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熊辉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亚非拉文学翻译 民族文学 冷战时期 文化交流

DOI: 10.19866/j.cnki.cjxs.2024.04.007

“十七年”在物理时间上主要是指1949—1966年的17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非常特殊的时期，它不仅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初阶段，是新中国政治和外交亟待破冰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际社会在美苏争霸格局下步入灰暗的冷战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在1949—1966年间对亚非拉文学的翻译就成为新中国改善外交关系和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特殊方式，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和评述无疑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可以为今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进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践行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没有研究冷战时期中国翻译亚非拉文学的专门成果，大量讨论冷战的论文或专著均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角度展开，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迎来了所谓冷战研究的文化转向，文

学翻译和文化交流论著依然有限。从搜集到的有限文献来看，目前关于中国与冷战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冷战研究的文化转向。尽管对冷战的大部分研究和评估都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类别中进行的，但对文化冷战的研究也很多。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在军事上展开竞争，而且在文化上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比如美国曾“招募法西斯分子，操纵别国民主选举的结果，供给不知情者金钱，私拆成千上万美国公民的邮件，推翻他国政府以支持独裁政权，策划暗杀，制造猪湾灾难”^①等，均显示出文化冷战的残酷本质。论文《重温文化冷战》即是对冷战时期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②，论述了冷战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原因，与20世纪80年代更广泛的文化转向的关系，以及冷战在文化维度的范围和范畴，集中分析了文化冷战及其国际影响，其跨国性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生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21&ZD258）。

①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427.

② Gordon Johnst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Vol.35, No.3, August 2010.

产和消费。简单地说,冷战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其主要参与者的民族文化?文化冷战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美学对抗,美苏对峙下各阵营对艺术、音乐、文学等的生产、消费和判断有不同的理由。该文还认为,冷战期间美学和政治之间没有完全一致,对文化冷战和现代主义历史的描述还不够充分,有些甚至完全忽视了现代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作用。

第二,冷战文化研究对东亚地区的忽视。有研究关注到文化冷战的问题,认为东亚地区的冷战与其他地方相比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但遗憾的是该地区的文化冷战被研究者忽视了。比如《朝鲜文化冷战,1945—1950》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东亚的冷战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热烈”,但遗憾的是在新兴的文化冷战研究中,除一些关于美国占领日本的著作以及情报和“特种作战”研究外,东亚几乎被完全忽视了。^①实际上,冷战时期的东亚境况与欧洲等地截然不同:一是1950年至1975年间的东亚是涉及主要冷战参与者的实际军事冲突的地点,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战斗资源被用于这一领域,但文化冲突往往比欧洲更粗糙,有时采取简单的战时宣传方法。二是尽管东亚冷战冲突具有公开性,但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始终将欧洲视为斗争中心,因此将最好的文化资源投入这一地区,从而使东亚在文化冲突上并不激烈。三是由于欧洲东方集团的崩溃,学者们现在可以接触到冷战双方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对相关文化冲突的资料掌握更是稀少。因此,大多数学者仍然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冲突的角度看待东亚的冷战,造成冷战时期文化和文学视域下的东亚被忽视。

第三,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分化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开始出现了分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和苏

联对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领导权的争夺,伴之而起的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加强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学翻译互动成为必然结果。《影子冷战:中苏争夺第三世界》^②一书认为,虽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都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革命进程,它将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然而他们各自都试图领导这些政党的革命并通过自己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棱镜来感知这一革命进程,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革命的优先次序。对苏联人来说,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事业始终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反帝国主义只有在达到更大目的时才显得很重要。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磨难有着更直接的经验,反帝国主义仍然是革命进程的指导重点和起点,社会主义被视为通过经济发展和独裁统治来改变全球力量平衡的工具。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这些相互竞争的革命议程之间的冲突,为了拒绝中国对其所谓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的挑战,苏联将被迫调整其革命议程,中国也加快了与亚非拉国家的外交联系。

第四,冷战时期中非关系研究和文学交流。由于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影响,中非关系历来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研究中非关系的文章,认为西方不应应对中非关系放松警惕。比如《丛林中的龙:北京在非洲的存在》^③一文写于1968年,文章称非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显得举足轻重,尽管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对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产生了影响,但中国仍然在非洲活动。可以肯定的是,1965年中非关系达到顶峰以来,中国在非洲公开的活动已经减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从1965年的17个降至1968年的13个,但西方必须谨慎,不要据此将非洲完全拒绝中国的想法等同起来。而《东风吹非洲:红色中国的

①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2, No. 1, Feb., 2003.

②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③ George T. Yu, "Dragon in the Bush: Peking's Presence in Africa", *Asian Survey*, Vol.8, No.12, 1968.

非洲攻势》(*East Wind over Africa: Red China's African Offensive*)是一部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和非洲关系的论文集,其中的《北京的宣传攻势》("Peking's Propaganda Push")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文学与非洲文学之间发生了频繁的交流,但目的却是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和革命理念的宣传。^①

第五,非洲英语文学在冷战时期的中立姿态。冷战时期非洲英语文学保持了中立的姿态,他们没有偏向前宗主国所在的资本主义阵营,也没有偏向民主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新兴民族国家同盟。《现代主义、非洲文学和冷战》^②一文认为,现代主义概念是一种审美自主权,是非洲英语国家非殖民化文学的基础,但同时也是一种中立的身份。文章在研究 *Black Orpheus*、*Transition*、转录中心(the Transcription Center)以及1962年在乌干达马凯雷雷举行的“非洲作家英语表达会议”档案的基础上,证明许多非洲作家都被现代主义的思想自由和文学超脱原则所吸引。Rajat Neogy、Christopher Okigbo 和 Wole Soyinka 等人都与这些新兴文化机构有着密切联系,他们重新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审美自主性,以宣告他们摆脱了殖民束缚、种族歧视制度,甚至摆脱了新的后殖民国家。在冷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现代主义审美超脱的理想也为这些作家提供了意识形态中立的语言。通过第一代后殖民主义作家对冷战中立的宣誓,非洲现代主义文学史和英语非洲文学史交织在

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冷战时期文化的研究中并没有特别关注到中国对亚非拉文学的翻译热潮,相关内容涉及非常有限;更为离奇的是,国外的研究更是忽视了中国对拉美文学的翻译,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冷战研究中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遗憾。

二、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对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国内同样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方面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与当时热闹的翻译现场相匹配的效应。但相较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德和俄苏等语种上。其中,英国文学翻译研究:有文章讨论了该时期英国诗歌中拜伦和雪莱的翻译^③,有人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英国文学翻译中的副文本功能^④,也有人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对英语文学翻译作整体观照^⑤。美国文学翻译研究:有对美国小说个案翻译的研究^⑥,有对美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整体扫描^⑦,有以美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来谈翻译规范问题^⑧。英美文学翻译研究:该研究是将英语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比如用符号学来研究英美文学的翻译^⑨,以英美文学的翻译为例来谈翻译的策略问题^⑩;又比如对该时期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的研究^⑪,以十七年间英美文学的翻译为例

① John Cooley, *East Wind over Africa: Red China's African Offensive*,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5, 193—205.

② Peter Kalliney, "Modernism,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old Wa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6, No.3, September 2015.

③ 张静:《革命浪漫主义话语下的诗歌译介——“十七年”文学翻译中拜伦与雪莱地位的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3期。

④ 余小梅:《“十七年”时期英国文学翻译副文本特征与功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⑤ 赵素红:《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的建国头十七年英语文学翻译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⑥ 张欣:《翻译文学与叙事冲突——新中国“十七年”麦田里的守望者重叙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⑦ 应承霏:《建国“十七年”美国儿童文学翻译概述(1949—1966)》《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⑧ 谢弘:《翻译规范视角下“十七年”美国儿童文学翻译——以陈伯吹译《绿野仙踪》为例》,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⑨ 李文佳:《“十七年”(1949—1966)英美翻译文学副文本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⑩ 卢玉玲:《翻译的周边文字——“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策略的改写功能分析》《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

⑪ 卢玉玲:《他者缺席的批判——“十七年”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研究(1949—1966)》《中国翻译》2011年第4期。

来谈翻译中的“误译”问题^①；还有专门讨论十七年间英美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中生发出很多有价值的话题^②。德语文学翻译研究：有论文以十七年间《世界文学》上刊发的译作为例来谈该时期的德语文学翻译问题^③。俄苏文学翻译研究：有论文讨论俄苏文学的翻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④，属于典型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成果。

部分翻译文学史著作从宏观角度考察亚非拉文学翻译史，呈现出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基本面貌。王友贵撰写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于2015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1949—1977年中国翻译文学的状况，认为这段时期的文学翻译是一种“体制化的翻译活动”^⑤，并对1977年以后的翻译文学作了详细梳理，堪称一部比较全面的翻译文学史著作。此书第16章“亚非文学及澳新文学汉译”中，专节介绍了日本、印度、朝鲜、越南等国文学的汉译，并涉及菲律宾、泰国、缅甸、老挝、印尼、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锡兰、黎巴嫩、约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蒙古等国文学翻译，同时用一节的篇幅统计了非洲国家文学的翻译情况，包括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马里、加纳、塞内加尔、几内亚、喀麦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文学的译介。在第17章“美洲文学汉译”中，“拉美各国文学汉译”一节浅析了智利、古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等国诗歌及小说作品的翻译。此书在整体上对亚非拉国家文学翻译的梳理比较详细，并结合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在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学翻译之外，对非洲和拉美文学的翻译情况梳理比较粗略，在“研究”的维度上也留下了亟待进一步细究的问题。

在宏观的亚非拉文学翻译史梳理中，还应关注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由周发祥等人撰写的“十七年及‘文革’卷”，第五章“‘文革’前的亚非拉文学翻译”专门讨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至1966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面貌。著者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和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对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由于同属第三世界，我国对亚非拉文学的翻译倾注了特别的关注，同样因为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我国对亚非拉各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对他们的独立斗争给予支持，对于他们建设国家的热情给予赞扬，这些情感都反映在文学翻译的选材和译介过程中。”^⑥该书归纳出当代亚非拉文学创作在主题上的特点，并从译介的体裁、题材两个方面阐述了该时期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特点，然后分区域梳理了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情况。亚洲国家主要讨论了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文学的翻译；非洲国家梳理了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等国文学的翻译；拉美国家主要概述了巴西、阿根廷、古巴、智利、墨西哥和海地等国文学的翻译，同时对学者型译者、作家型译者和其他知名译者做了详细的介绍，统计出了各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具体条目，显示出扎实严谨的学风。该书仅用一章的篇幅来谈论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情况，由于篇幅所限难以充分展开论述；而就行文内部来讲，亚洲各国文学翻译情况的内容比非洲和拉美详细，而拉美各国文学翻译的梳理又比非洲详细，导致三个部分的篇幅严重失衡。换句话说，对非洲和拉美文学翻译的梳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有待学界做进一步细化和提升。

在整体上研究1949—1966年间文学翻译的成果中，有些涉及亚非拉文学的翻译问题，这些研

①卢玉玲：《“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

②卢玉玲：《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重塑——“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③孔学静：《“十七年”时期《世界文学》（译文）杂志的德语文学翻译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④陈南先：《十七年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⑤王友贵：《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⑥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究采用多种角度和多种批评方法,从而发现了十七年间翻译文学的“多副面孔”。第一,亚非拉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学的特殊关系。方长安的专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主要讨论了苏联和英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问题,第六章“‘十七年’与亚非拉的文学交往”却开拓性地研究了十七年文坛与亚非拉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①第二,意识形态对十七年间文学翻译的影响研究:有论者采用翻译文化学派的研究路径,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经历了从主要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到广泛引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古典和经典英美文学作品及亚非拉反殖民主义作品的过程,证明了在当时翻译政策和文艺思想指导下引入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巩固新生共和国政权、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②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文学翻译还应提及李蔓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认为1949—1966年间翻译始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服从建设强大的国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特征。^③论文采用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学派理论,从文化层面分析了该时期文学翻译中的改写行为是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操控的结果,从而将十七年间的翻译研究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话题。第三,从翻译社会功能的角度研究十七年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作用:熊辉的论文《“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从翻译文学社会功用的角度来研究该时期的文学翻译,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殖民化因素难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根除,加上新的文化殖民形态乘势入侵,故当

代文学在1949年后还肩负着解殖民化的重任。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十七年间的翻译文学显示出较强的解殖民化特征:与苏联和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文学的结盟,增强了自身在解殖民斗争中的力量;对英美强势文学的限制,对其内部反抗精神的挖掘与呈现,有力支撑了自身解殖民的意图。^④但十七年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诉求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主体性的削弱、翻译选材的“规定性”以及欧美经典文学翻译的缺失等。

专门研究亚非拉文学翻译的成果十分稀少,但也不乏有价值的研究作品。在拉美文学翻译研究方面,腾威撰写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不可多得的代表性专著。该书于2011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三个阶段用七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从时代语境和文学发展诉求两个维度分析拉美文学汉译的动因,突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拉美文学汉译的互动关系。仅就1949年至1977年的拉美文学翻译而言,该书认为是中国文学和社会政治诉求塑造了拉美文学的“革命文学”形象,通过自身的翻译建构了自身所需的拉美文学,因存在严重误读而没有呈现拉美文学的本来面貌,遮蔽了拉美文学的丰富性。著者注重选取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和国家为研究对象,能够从研究对象中提炼出鲜明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拉美文学翻译的史料整理和细节上还留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就如著者自己所言:“由于中国的拉美文学翻译以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以下简称‘西语美洲文学’)为主,而且西语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刻,所以本书重点讨论的是西语美洲文学的汉译。”^⑤而在拉美广袤的土地上,使用最广泛的除了西班牙语之外,还有葡萄牙语和法语等拉丁语系的语言,并且从实际的翻译情况来看,1949—

①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93页。

②刘彬《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李蔓《翻译与政治——试论意识形态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翻译的影响》,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④熊辉《“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⑤腾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966年间拉美文学翻译最多的是古巴和巴西两国的作品,而巴西的官方语言恰恰是葡萄牙语而非西班牙语,虽然当时有些作品是通过英语或俄语转译的,但无论怎么讲,主要依靠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来研究拉美文学的汉译是不全面的。

谈论 1949—1966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朝鲜文学翻译上。金鹤哲的论文《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是迄今为止对1949年至1966年间中国对朝鲜文学翻译梳理最详细的文章,第一部分“1949—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基于国际国内政治语境的变化,分析了朝鲜文学翻译进程中呈现的特点,以编年的方式列举了1951—1965年期间每年翻译出版作品的详细信息。第二部分“冷战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论述了国际冷战背景对朝鲜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其中抗日题材的作品、朝鲜南北战争和反美题材的作品,以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等成为朝鲜文学翻译的主潮。^①该文也指出冷战时期对朝鲜文学翻译存在着重政治意识形态而轻视审美艺术的不足,以及该时期翻译文学自身存在翻译人才储备和转译作品较多等弊端。在朝鲜文学的翻译研究中,郑晶的《建国十七年朝鲜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改写现象研究》不是专门的翻译史研究,而是借助勒菲弗尔等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分析社会意识形态对1949—1966年间朝鲜文学翻译的影响,认为该时期朝鲜文学的翻译是一种在社会意识形态操控下进行的改写行为,通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方法,借助翻译过程中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朝鲜文学作品进行改写的实际事例,并对具体的诱发改写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朝鲜文学作品的翻译存在四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强化正面人物的正面形象,弱化正面人物的反面描写,强化反面人物反面形象,添加或强化意识形态信息。引起这种

改写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当时在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斗争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②该文的分析具有实证效果,得出的结论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对引发翻译改写的因素分析不充分,因为除了上述原因,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开拓国际生存空间和扩大对外交往密不可分。

专门研究 1949—1966年间非洲文学翻译的成果还处于缺席状态,只在长时段的非洲文学翻译研究中有所涉猎。有研究认为我国对非洲文学的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并且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之后出现过翻译出版小高峰,不过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翻译出版的持续性、自觉性和主动性等都呈现总体较为零散、单一和薄弱的特征。但非洲文学的翻译加强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十七年间非洲文学翻译存在如下不足:“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出版质量,非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均在‘十七年’期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翻译类作品尽管涉猎了非洲诸国多题材的文学门类,但总体是以‘政治’题材以及由政治题材所延伸的相关民族文化类作品为主,而未能从或审美或国别或作家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翻译出版,这种遵循特定历史时期文艺政策而进行的‘拿来主义式’的‘文学翻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非洲文学翻译出版的残缺,诸多有着充分艺术创造性却并不符合国内政治观和文学观的非洲优秀作家作品也就自然被拒之国门之外。”^③非洲语言丰富,除具有民族性的地方语言外,英语和法语是其中的主流语言。研究非洲法语文学的袁筱一指出,非洲法语文学作为有别于民族文学的新法语文学已经有近百年历史,而且在21世纪成为非洲文学的重要支撑力量,尽管如此,非洲法语文学却没有成为中国翻译界关注的重点。^④有人专门讨论了非洲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如《非洲法语文学在国内的翻译》一文认为,非洲法语

①金鹤哲:《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东疆学刊》2017年第1期。

②郑晶:《建国十七年朝鲜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改写现象研究》,《东疆学刊》2018年第1期。

③邓耘:《近百年来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征与困境探析》,《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

④袁筱一:《非洲法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体系的变化》,《外国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翻译到中国,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而且缺乏对非洲法语文学经典作品必要的关注。^①

此外,也有成果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分析亚非拉文学传入中国的原因、途径以及对“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亚非拉文学强化了中国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写作意识,使中国作家具备了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在与亚非拉文学的交流中习得了更多的创作经验,并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创造了更多的条件。^②

三、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意义

从以上对国内外研究中国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开掘的广阔研究空间。

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史料整理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史料搜集工作亟待展开。国内冷战时期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史料整理工作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虽然对期刊和出版物的保存日益完善,但1949—1966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文献仍需归类整理,有的面临散佚的危险,应及时抢救。二是海外资料的缺席。国外有关中国的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史料和文献处于被漠视状态,很少被提及和翻译到中国,严重制约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国际性视野,回避了对很多核心问题的思考。要推动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研究的深化,海外资料不可或缺。因此,应该围绕“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资料整理”这一中心工作,到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新闻出版署档案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档案馆或资料室搜集散落的有关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出版资料,通过检索查阅、翻译、文献汇辑、校勘、编年整理等工作,为中国翻译文学(1949—1966)、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社会政治学等提供一套扎实可靠、新颖全

面的文献资料集成,推动“十七年”翻译文学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对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翻译史料的梳理存在漏缺,很多研究只关注正式的出版物或公开刊物上的翻译作品,而很少关注内刊文献。二是研究缺乏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全球眼光,多局限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内部来讨论,同时难以处理好文学交流和政治外交之间的辩证关系,总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决定文学翻译的单一模式中展开研究。三是欠缺跨学科研究手段。学术观点的创新有赖于方法的突破,虽众多学者自觉地采用了跨文化或社会政治学的方法,但基本还是局限在文学内部。必须采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深究本质并有所创新。在冷战时期亚非拉文学翻译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应该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印证国内已有研究,纠正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盛行的错误描述和论断,还原真实的文学翻译现状和历史,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去阐释翻译文学现象或中外文学交流情况,获得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观念,开拓更广阔的翻译文学和当代文学言说空间,利用新资料重新阐释亚非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突出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文本作为特殊的文化交流中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将亚非拉文学翻译视为特殊的翻译现象,并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站在特殊而宏大的跨文化和跨语际书写高度审视“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史和深远内涵。

加强对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第一,可部分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现状,完善对其时文化发展战略的认识。文学翻译“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参与、回应、协商以至影响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甚至是具体地对独特文化问题作出回应”^③,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本质上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与中国作家的创作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的翻译共同构成了1949—1966年

①汪琳:《非洲法语文学在国内的翻译》,《时代文学》2015年第7期。

②蒋慧:《亚非拉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以译文为考察中心》,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③王宏志:《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

的文学生态,也为我们观照“十七年”文学提供了“他者”的视角,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二,史料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增长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差很大程度上是史料缺乏所致。因此,本课题搜集整理的资料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而言意义重大,它从翻译文学和“域外”的维度使之趋于完备,有助于增强其学科属性。第三,对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属于跨文化和跨语际学术活动,且这些史料涉猎广泛,涵括了多学科知识,对之加以整理、翻译和研究必须突破学科藩篱,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国际视野才能实现课题目标,这也符合当前新文科建设的思路。第四,解决学术疑难问题。本课题搜集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为当代文学创作及文学史研究中遗留的疑难问题提供言说的新角度和新证据,开辟学术新境界。

加强对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现实价值。一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当代文学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胸襟批判性地借鉴吸纳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本课题的史料亦是亚非拉国家文

明的载体,对其加以整理小则可以推动翻译文学研究的发展,大则是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二是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打捞有关史料并对之加以研究,有助于翻译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提升,可为今天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供思路和经验,增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三是续写中国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发展中也逐渐积淀起了自身的现代性传统。因此,本课题可为承传和续写中国文学传统提供崭新的史料支持,丰富中国文学传统的内涵。

总之,我们应该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文化形势出发,研究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活动及其产物对改善中国外交关系和拓展中国国际生存空间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美-苏”“中-苏”“政治-文化”“翻译文学-民族文学”等二元对立模式中探究有效的研究路径,突出文学翻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先锋作用。

A Review on the Translation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of New China

Xiong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Seventeen Years” (1946—1966) is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reached a climax owing to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purposes at that time. However, research on this stage is limited both home and abroad. Foreign research is confined to the Cold War and is mainly angled towards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and diplomacy, but seriously neglects culture. Domestic research is also limited. However, compared with foreign ones, a relativel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discussio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found in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are also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A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whil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remains nearly blank.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advocat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recognize th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and further enhance relevant research to contribute to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Cold War; Cultural Exchanges

责任编辑:张晶